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3.006

从曾国藩科举观看其家教思想

潘岳风

(桂林旅游学院 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在对待科举的观念上, 曾国藩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对弟弟们和长子曾纪泽的科举, 曾国藩表现出不必学科举、不强求中举、得失不足挂怀的观念; 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 他表现出始于重视终于释然的观念。曾国藩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未中举, 曾国藩并没有让他们困在科举的泥潭里, 而是引导他们另辟蹊径, 使他们最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国藩的科举观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观念, 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家教思想, 诸如读书非功利、得失随缘、笃立大志、孝友传家、因材施教、开明务实等思想, 这些思想对家族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曾家成为享誉中外的百年家族。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历久弥新, 在当下的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和家风传承等方面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曾国藩; 科举观; 家教思想; 读书; 孝友传家

中图分类号: B24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3-0041-08

引用格式: 潘岳风. 从曾国藩科举观看其家教思想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3): 41-48.

View Zeng Guofan'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 from His Outlook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PAN Yuefeng

(Library of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Zeng Guofan held entirel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those in favour of the mainstream education concept at that time. Zeng Guofan did not pressure his younger brother and eldest son Zeng Jize to 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giving no thought to personal gain or loss. As for his second son Zeng Jihong who also attend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eng changed his attitude from giving adequate attention initially to feeling relieved at whatever the result finally. Zeng's younger brother and his two sons who failed to 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not bogged down in the mire of it. Inste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Zeng, all of them found new paths and finally achieved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ir fields. Zeng Guofan's view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not only a simple educational concept, but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such as reading not for utilitarian purpose, not worrying about personal gains and losses, having lofty aspiration, showing filial respect to parents, treating siblings friendly,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nd being open and pragmatic. These thoughts ha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members, making Zeng's family a century-old famous famil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Zeng Guofan's thoughts on family

收稿日期: 2022-11-17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曾国藩传统家风治理思想研究”(2022KY0801)

作者简介: 潘岳风(1985—), 男, 广西鹿寨人, 桂林旅游学院图书馆馆员,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

education are enduring and inspirational, also serving as an agent for current study, education, employment as well as inheriting family traditions.

Keywords: Zeng Guofan; outlook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 study; family tradition of showing filial respect to parents and treating siblings friendly

在传统时代,科举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考科举是士人的人生大事,一旦考上,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获得官职,改变命运。所以古代士人大都特别重视科举。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作为千万士人中的一员,他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上层。他从道光四年开始考秀才,前后花了十四年才考中进士,过程曲折。不过,科举给他的回报也是极大的,他初期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又历任礼部、兵部、刑部等部门的侍郎,最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谓位极人臣。

曾国藩所取得的成就与科举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科举给他提供平台和机会,他不会改变命运。按理说,他从科举中获益甚多,自己又身居要职,应积极鼓励和教导家人参加科举。然而,通过对《曾国藩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和《曾国藩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等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他对科举的观念和人们想象中有所不同。

一、曾国藩的科举观

(一) 尽可不学科举

在传统时代,如果官宦子弟能够传承父亲的衣钵,便是家族的一大幸事。从这一点来说,官员重视子孙的科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从《家书》和《日记》来看,曾国藩在长子曾纪泽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教他学习科举制艺等内容,只是单纯教他读书。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这个情况后很是焦虑,数次写信叫他重视曾纪泽的科举:

朝廷立法数百年不易者,惟制艺(八股文)耳,尔等亦[不]必深鄙也^{[1]72}。

本朝以文章诗赋考言,以字迹端方取士,实属不易之良法。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1]85}。

除了父亲的敦促,他的九弟曾国荃也劝他教曾

纪泽考科举:

甲三(曾纪泽小名)侄天分既高,弟意愿老兄仍教他兼读八股,且需开首做半篇。以八股之法范之,庶几更易于成就。如欲其学圣贤为伟人,不局于小成小就,则不做八股工夫尽可,而八股工夫,亦断无碍于正业也^{[2]558}。

迫于父亲和弟弟的压力,曾国藩只得答应按北京官宦子弟的习惯,待曾纪泽十四岁时就教其八股。看上去言之凿凿,实际上曾国藩后来食言了。曾纪泽十四岁时,他仍没让曾纪泽学八股。直到咸丰四年曾纪泽十五岁时,曾国藩对曾纪泽的科举仍不甚重视。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书中说:

至甲三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3]254}。

八股文和试帖诗都是科举的必考文体,精通其是考上科举的必要条件,曾国藩明确提出了不让曾纪泽学八股的观点,这分明是不重视曾纪泽的科举。在翌年三月二十日的家书中,他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儿子史鉴略熟,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纲目》一遍为要^{[3]260}。

曾国藩不仅不让儿子学作八股文和试帖诗,还强调不学这些是极其重要的事,并且嘱咐曾纪泽看一本与科举无关的书《资治通鉴纲目》。可见他对曾纪泽考科举并不重视。

正因为他对儿子科举教育的长期忽视,曾纪泽的考试能力较弱。咸丰八年,曾纪泽第一次参加乡试,曾国藩了解儿子的考试能力,便未给儿子任何压力,用不在乎成败的态度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3]373}他表现得十分淡然,一切顺其自然,与那些临场前焦虑的父母截然相反。不出意料,曾纪泽果然没考上。之后,在九弟曾国荃、曾纪泽老师邓寅皆和部下李元度

等人的多番劝说下，曾国藩不得不开始督促曾纪泽考科举。他在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规定曾纪泽“每月作四书文(八股文)三篇”^{[3]403}。翌年，他不仅要曾纪泽认真考试，还亲自指点写八股文的方法。无奈前期被忽视的时间太长，曾纪泽的科举基础十分薄弱，靠后天弥补很难提高。在后两次乡试中，曾纪泽都落榜了。经历了三次落榜，曾纪泽对科举心灰意冷，转向了当时新兴的西学。对此，曾国藩并没有表示反对和遗憾，而是平淡地说了一句：

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4]39}。

他同意了儿子的选择，不强求儿子继续考科举。在父亲的支持下，曾纪泽潜心研究西学，后来成为一名外交家。

(二) 科举不足挂怀

曾国藩的四位弟弟都参加过科举，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面对弟弟们的科举，他总是以得失随缘、不足挂怀的态度去安慰：

四弟(曾国潢)、六弟(曾国华)考试，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3]10}。

四弟、六弟考运不好，不必挂怀。……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3]24}。

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3]48}。

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3]91}。

洪弟(曾国葆)考试不利，区区得失，无足介怀^{[3]149}。

这些家书里，“得失”“不足挂怀”“不足介怀”等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说明曾国藩不把科举的得失放在心上，也不让弟弟们把科举的得失放在心上。这种豁达、淡泊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少见的。之所以看淡科举的得失，是因为在他看来，科举是“小试”：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3]34}。

他把科举称为“小试”，并批评六弟曾国华志气太小。这直接流露出他的观点：科举是小道，是小志者才做的事。在之后的家书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科举的观念：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

万不可易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3]49}。

读经史是有大志者做的事，换言之，科举是小志者做的事。如此对比，高下立判。这不仅仅是淡泊科举，更是对科举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识。四位弟弟最终都落榜了，这与他们的天赋、性格和勤奋程度有关，例如曾国潢擅长家政而非考试。虽然性格和能力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曾国藩没有给他们科举的压力。因此在落榜后，除了曾国华表现出“不中举，心中总郁结不开”^{[2]545}外，其他三人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失落。科举不顺并没有限制他们的发展，曾国潢走上了家政之路，其他三人都走上了从军之路。除曾国华和曾国葆早逝外，曾国潢和曾国荃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正如曾国藩的教导，弟弟们并没有被科举束缚。

(三) 始于重视终于释然

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曾国藩与对曾纪泽和弟弟们的观念略有不同。最初，与对曾纪泽一样，他对曾纪鸿的科举也不甚重视。但曾纪鸿表现出科举的天赋，在同治元年考上了县试第一名、院试第五名^{[5]304}，顺利成为秀才，得到了参加科举的资格。这让一向顺其自然的曾国藩喜出望外，在《家书》中兴奋地说：“前闻尔县试幸列首选，为之欣慰。”^{[4]27}翌年，曾纪鸿问他是否可以参加乡试，他明确让曾纪鸿赴考：

尔问今年应否往过科考？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4]164}。

这个答复的立场很鲜明，就是明确要求曾纪鸿参加乡试，还指出科举是“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这与前文曾麟书所说的“朝廷立法数百年不易者惟制艺”何其相似。这犹如一个轮回，他也成了当年敦促儿子重视科举的老父亲。

虽然曾纪鸿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没有良好的过程。根据《家书》透露的信息，曾纪鸿不够勤奋，略为懒惰，缺乏恒心，自小生长在宦宦之家，处境太顺，多少沾染了富家公子的习气。这些缺点都导致他原地踏步，缺乏后劲。曾国藩对此很失望，但没有放松对曾纪鸿的教导，反而更加严厉地督

促曾纪鸿考科举。他先是让曾纪鸿留在曾国荃的府邸安心读书, 给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其次是聘请精通八股文的名师, 在同治五年四月到六月的家书中, 曾国藩先后提到四位名师——黄宅生、胡东谷、宋生香和李申夫^{[4]421-433}。翌年, 他还在家书中说“拟访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4]485}。如此不厌其烦地聘请名师, 这在曾国藩的家教里是不多见的。最后是指导阅读教辅书《仁在堂全稿》《怪华馆试帖》《文献通考》等。这些教材选取的都是优秀范文, 可以提高应试水平^{[4]426}。

曾国藩重视曾纪鸿的科举, 却不重视曾纪泽和弟弟们的科举, 似有双重标准之嫌, 实际两者并不矛盾。其原因有二。一是曾纪鸿考上县试第一名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让他对曾纪鸿充满信心, 直接促成了他对科举的重视。曾国藩是一个尊重儿子天性的父亲, 看到曾纪鸿在县试和院试里取得好成绩, 他不可能放弃良好的开端, 对儿子的科举天赋视而不见。二是曾纪鸿没有荫生资格, 须有个谋生之业。清代有荫生制度, 即高级官员的长子可以继承官位, 但要降低品级。曾纪鸿是次子, 没有荫生资格, 意味着他要自食其力。所以, 曾国藩重视科举主要是让曾纪鸿有一个职业。曾国藩去世后, 曾纪鸿没有官职, 经济拮据, 不得不向左宗棠借钱^{[6]313}。这也印证了曾国藩的预想。

虽然得到了如此多资源, 但曾纪鸿的八股文仍然是“文理浅陋”, 几次均未中举。曾国藩虽有失望, 但也像对弟弟和曾纪泽一样, 并未强求曾纪鸿中举, 终于释然。在曾国藩逝世后, 曾纪鸿获得了特赏举人的资格, 可以跳过乡试直接参加会试, 但他还是落榜了。接连落榜让他对科举失去信心, 但他发现了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 努力钻研数学, 最终成为晚清著名的数学家。

二、科举观中蕴含的家教思想

曾国藩对科举有过重视, 也有过不重视。综观他的人生和态度, 不重视的成分大于重视的成分。他不把科举当作人生的唯一出路和读书的唯一目的, 不过度在意科举的成败, 心态比较淡然。通过对《家书》和《日记》等文献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的科举观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家教思想。

(一) 读书至上, 摒除功利

在科举的发展历程中, 读书的功利性逐渐加强, 许多人读书就是为了考中进士, 做官发财, 读书异化成求取富贵的敲门砖。曾国藩反对这种功利化的读书, 他在《日记》中引用苏轼的诗《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 并添上几句, 从而变成: “治生不求富, 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 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 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 欲辨已忘言。”^{[7]500}表明了读书的非功利性。曾国藩认为读书本身是比科举更重要的事, 读书最根本的目的是进德修业, 而非科举:

吾辈读书, 只有两事: 一者进德之事, 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 以图无忝所生; 一者修业之事, 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 以图自卫其身^{[3]31}。

进德指的是提高道德境界, 依照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阶路径来修炼自我, 不断进化, 止于至善, 无愧于自己的生命,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君子; 修业指的是提高业务能力, 熟习记忆、诵读、写作等技术, 掌握谋生的技能, 用自己的技能立足于世。道德上要成为圣人, 业务上要成为能人, 也就是儒家说的内圣外王。进德修业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 它比科举更重要、更纯粹。如果考上了科举, 却没有做到进德修业, 那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曾国藩说有些中举的官员理论与实践脱节, 读圣贤书却不能行圣贤之行, 能文能诗却不能修己治人, 冠冕堂皇却不能进德修业, 这些人只能称作“牧猪奴”, 即养猪的奴才^{[3]35}。这种犀利的讽刺在《家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可见他对这类官员的鄙夷。读书不能光是为了科举, 这样即使考上了, 也会把圣贤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偏离读书的本义, 有读书人之名, 无读书人之实。读书就是要把圣贤书的内容当作分内之事, 进德修业, 知行合一, 做到名副其实。相反, 即使没有考上科举, 但能把书读到实处, 提升自己的学识和修养, 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行, 那也是成功的读书人。曾国藩以清代著名学者汪绂(汪双池)为正面教材。汪绂一贫如洗, 从事画碗这种被时人轻贱的职业, 三十岁后才读书, 一生不考科举。但他一生勤做学问, 坚持不懈, 著书丰富, 照样成为一代“名儒”^{[3]93-94}。“名儒”一词在《家书》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可见他对汪绂的敬仰。

一边是中举的“牧猪奴”，一边是不考科举的“名儒”，曾国藩对前者充满鄙夷，对后者充满尊崇。这形成了强烈对比，鲜明地折射出曾国藩的思想：读书，读的不是功名，而是书中的知识、精神和道理，科举不过是其中一个不甚紧要的目的，并非全部。曾国藩的科举观回归读书的本义，以进德修业、践行书本等为主要目的，摒除了功利主义，澄清了浮利之心，回归到了纯粹的修行和学习。

（二）得失相随，顺其自然

前文举例，曾国藩在安慰弟弟科举失败时，提到了三次“得失”。得失是中国哲学里的重要概念，充满了辩证意味。曾国藩对得失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得失是捉摸不定、相互转化的，因而劝弟弟不要放在心上。他对得失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论述：

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之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廿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街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此四事者，皆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3]401}。

他用自己经历的四件事证明了得失相随，福祸相倚，世界永远处在变幻无常之中。人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总是在得失中循环往复。既然得失相随，得到的喜悦会被以后的失去冲掉，失去的忧虑会被以后的得到冲掉，世事如此无常，也就“得不足喜失不足忧”了。这种思想显然有道家色彩，恬淡无为，顺其自然，不汲汲于功名，少了一份执着，多了一份随缘。

（三）笃立大志，成就大我

曾国藩并不迷信科举，科举只是人生的“小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读书要立大志：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3]42}。

一旦立下了远大的志向，人就不会甘心沉沦下流，目光和精力都会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自我转向天下，从小圈子转向大世界。与广阔的世界和漫长的人生相比，科举只是无足轻重的小

插曲。在曾国藩因落榜而自怨自艾时，他使用立志的思想来教导：

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3]34}。

“民胞物与”是北宋理学家张载创造的成语，意为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与我合一，指泛爱一切人和物，比喻与天地同造化的博大胸怀。人有了大志，就会有民胞物与的精神，泛爱世人，亲近万物，把感情投射到家国天下、内圣外王、贤良小人这些宏大的命题上，自我的得失与天下的安危、国家的治乱、百姓的苦乐对比起来，就显得十分微小，算不上什么挫折了。有了如此志向，人就会把个人的得失、自我的浮沉看作微不足道的事，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不再自怨自艾，科举自然就成了小事。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把读书当成科举的工具，忽视了立志在读书中的作用，从而本末倒置，把立志放在末位，反而把科举当成“大试”。曾国藩把立志放在读书的第一位，其实是抓住了教育的精髓。他教导家人跳出科举的怪圈，不为科举的成败而悲喜，用大志来突破小我，提升境界，成就大我。

（四）官家短暂，孝友传家

自曾国藩考中进士后，曾家就成了官宦之家。成为官宦之家好处甚多，不仅体面威风，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颇多实惠。古代家族重视科举，与此不无关系。但他并不以此为荣耀，也不愿意子孙后代延续官宦之家的血脉：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3]289}。

正因为不愿子孙做大官，而愿做君子，所以是否中举都无所谓。比科举更重要的是孝友。一家人能孝悌父兄，友爱家人，互助互利，形成融洽的氛围，比考上科举更实在：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弟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3]60}。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3]78}。

曾国藩不求弟弟们能考上科举,只求他们注重孝悌,多在孝友上下功夫,这才是“大者远者”。之所以重视孝友,不愿后代传承官宦之家,是因为他对比了四种家族,发现官宦之家是生命力最差的家族,孝友之家是生命力最强的家族: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3]167}。

官宦之家的风险太大,子孙倚仗家族势力而骄奢淫逸,然后放荡不羁,败光财产,透支运势,招致反噬。家主死后,家族失去了顶梁柱,便遭遇灭顶之灾。曾国藩熟读历史,他以汉代权臣霍光为反面教材^{[4]326}。霍光在世时独揽大权,他死后霍家即被灭族,正如曾国藩说的“一代享用便尽”。曾国藩不愿这种悲剧在自家重演,所以考不上科举也无关紧要,这样就不会重蹈官宦之家的覆辙。孝友之家是孝悌父兄、家人友爱的家族,家人们秩序井然,人伦和美,勤俭持家,远离官场是非,没有政治风险,不会遭到嫉妒,能延续八至十代,是最理想的家族。所以曾国藩极力提倡孝友之家,这样能使家族长保盛美,避免短命的厄运。从这点来说,淡泊科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家跳出了官宦之家的怪圈,成为孝友之家。在曾国藩之后,除了曾纪泽做过外交官、长孙曾广钧考上进士外,曾家后人极少从政,却依然人才辈出,绵延百年。

(五) 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兴趣,适当顺应,会发展为人的特长。如果强行改变,让其去学习不感兴趣的事物,不但会埋没天赋,而且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虽然科举是当时最主流的晋身之道,但曾国藩并没有强求他的家人考上科举,而是根

据各人的天赋、个性和兴趣,因材施教,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各自领域的能手。

曾国藩擅长识人相人,《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8]他把识人的才能运用到家人身上,就成了因材施教的思想。例如,他知道曾纪泽“记性不好”^{[3]159},写八股文“天分本低”^{[3]254},以这样的基础是很难考上科举的。但曾纪泽有其他方面的天赋,那就是科学的天赋。他看出了这些天赋,说:“尔看天文,认得恒星数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曾翻阅否?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3]393}虽然天文历法在当时并非主流学科,但他鼓励曾纪泽精通天文历法,能顺应儿子的天赋鼓励其去研究“不入流”的学科,在那个时代是大胆的思想。曾纪泽转向研究西学,也得到了他的同意。后来曾纪泽与俄罗斯谈判,收回伊犁,虎口夺食,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少有的成功外交。这些都是曾国藩循循善诱的结果。

对诸位弟弟也一样。他知道曾国潢作诗“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3]91},且借口家塾耽搁学业,实际上是不能发奋自立^{[3]34};曾国荃“读书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3]26}。诸位弟弟都不适合考科举,所以曾国藩根据他们的个性和才能,让他们另辟蹊径。他让曾国潢在老家管理家政,让曾国荃参加湘军。结果,曾国潢成为著名士绅,把曾家经营得有声有色,使曾家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曾国荃战功赫赫,成为湘军名将,官至山西巡抚、两江总督。

曾国藩尊重了家人的个性、兴趣和才能,不强行统一路径,因材施教,顺应天性,鼓励发展兴趣爱好,让他们发挥天赋,施展才能,作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这也证明了曾国藩家教的成功。

(六) 开明务实,与时俱进

曾国藩是一个务实且讲求经世济用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7]234}。

经济即经世济用,指读书要结合并应用于实际,对社会有用。以往桐城派理论只有义理、词

章和考据，他补充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

科举却与经济相悖。不可否认，四书五经有很多修身治国的至理名言，科举的形式和内容也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些内容理论性强，实用性、操作性弱，会造成空有理论、缺乏动手能力的问题，前文所述“牧猪奴”就折射了这个问题。而且科举旷日持久，“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膈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3]77}。应试者耗费了大好年华，却学不到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就包括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与其花费大好年华去考科举，还不如学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直接给社会和大众创造福祉，这种方式未必就比科举差。

曾国藩不仅务实，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曾对弟弟说：“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弟行军太少变化。”^{[4]73}可见他有与时变化的一面。晚清是一个新旧交替、西学东渐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事物大量涌现，改变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曾国藩受的是传统教育，但他从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在十二月初六日的日记中有一段附记：“徐寿、龚之棠、斯桂、殷家隽、吴嘉善；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5]371}徐寿等人是科学家，是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的代表人物；光学等是洋务运动中引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虽然这只是简单记录，没有展开论述，但至少说明他开始关注西方科学。他还称赞李鸿章创立机器局：“李相（李鸿章）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4]502}此外，他还资助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带学生去美国留学，促成了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些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思想开明、与时俱进的人。

相对新兴的西方科学，科举的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缺乏自然科学，难以培养出具有务实与科学精神的人才，跟不上时代潮流。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批评科举说：“古来也有许多人才从科举出来的，但是科举究竟是产生不出人才的制度。”^{[9]49}这对开明的曾国藩来说，并非一种好的教育制度。这种开明的态度对两个儿子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曾纪泽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成了外交家；曾纪鸿研究数学，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成了数学家^{[6]311}。如果没有这种家教思想，恐怕兄弟俩一生都会受到科举的煎熬，更遑论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了。曾国藩逝世33年后，科举被废除，印证了曾国藩的先见之明。

三、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启示

历史积淀下来的思想总是历久弥新。虽然已过百年，但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并未过时，放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一）读书为体，考试为用

如今，高等教育在逐渐普及，本科生、研究生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读大学在很多时候成为“刚需”，没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确实很难找到好工作。如果要现在的父母像曾国藩对待科举去对待高考，这是很不现实的。毕竟高考的录取率比科举高太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曾国藩非功利的读书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高考等考试固然要重视，但过度重视，把高考推上神坛就过犹不及了。可以以读书为体，考试为用。体意为本体，是根本的、本质的；用意为应用，是表象的、外在的。体是第一位的，用是第二位的。高考固然重要，但读书，读的是知识、能力、技术、学养和格局，这些才是主产品；考试成绩是第二位的，是副产品。只重考试不重读书，只为考高分，不为学知识，格局太小，以后为人处世必定狭隘，乃至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读书和考试并重，有知识，有格局，才会培养出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人。书读好了，考试的下限不会太低，正如曾国藩说的“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3]535}；如果只是以读书为考试的手段，就会本末倒置，人格难以健全，人生难以圆满。对于考试，以平常心对待即可，不拔高，不迷信，不神化，真正该重视的只有读书而已。

（二）路径多元，避免单一

曾国藩生活的年代，晋身之道是比较单一的。如今，科学技术发达，社会分工细化，生活方式多样，但不少父母仍然认为考公考编是最好的晋身之道，甚至出现了“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和开着宾利去考公等极端现象。部分人的观念仿佛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反不如曾国藩开明和

理性。平心而论,公务员收入稳定,工作体面,地位较高,是一份不错的职业。但现在的就业路径和上升渠道是多元的,早已不像曾国藩时代那样单一,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大企业还是小公司,线上还是线下,只要能实现个人价值,创造财富,有益社会,就不失为好职业,何况不少体制外职业的待遇和认同度不逊色于体制内,何必死守单一的就业观不放?在科举至上的时代,曾国藩尚且能同意家人放弃科举;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更不必对考公考编抱有过度的执念,“条条大路通罗马”,适合自己且能安身立命的工作就是好工作。

(三) 家风传承, 物质为轻

曾国藩认为宦宦之家生命力差,孝友之家生命力强。他还认为给后代留太多遗产有害无益: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3]163-164}。

所以曾国藩淡泊科举,也没留太多遗产给两个儿子。现实中,一些官员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形成家族式腐败。一旦东窗事发,整个家族被连根拔起。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倚仗父辈的权势和金钱,挥金如土,生活糜烂,轻易把家产败光。宦宦之家和富贵之家确实难以长久,因为他们没有良好的家风,人人利字当头,没有形成家族凝聚力。传家,传承的不是权力、金钱等物质,而是良好的家风、自立的风骨、孝友的氛围等精神。这些精神财富看似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利益,但能使家族成员关系和睦,自力更生,低调谦虚,勤俭持家,养成大家风范,给家族的延续注入强大而绵长的后劲,这才是传家的长久之道。

(四) 顺应天性, 切忌安排

一些父母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去安排子女的学习和人生,比如,不管子女有没有艺术天赋,强行给他们上舞蹈班;不管儿子是不是喜欢理科,因为其是男生就强求其学理科。这种安排在现在的教育里屡见不鲜,即使子女提出异议也无用,父母会以子女阅历少等为由反驳,觉得

自己包办儿女的选择天经地义。这一点不如学习曾国藩尊重儿子的家教思想。古语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遇到儿女兴趣不合自己意愿时,不要急着去反对和禁止,多倾听儿女的意见,如果有理,不如尊重选择,善加引导,让其往好的方向发展,如同曾纪泽和曾纪鸿,虽然考不上科举,但能发挥自己的天性,依然能成才。再者,儿女知道的未必比父母少,他们很清楚自己选择的好坏,如果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有作出自我选择的权利。父母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了就给他们提供支持,错了就及时纠正,仅此而已。尊重儿女的选择,不刻意安排他们的人生,这就是曾国藩给现代人的家教启示。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是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家族的写照。曾家却跳出了这个怪圈,家业兴旺,长盛不衰,曾国藩的家教堪称治家成功的典范。本文只是从曾国藩的科举观出发来探讨其家教思想,不免有偏狭之处,其实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探讨的只是冰山一角。未来将从其他角度切入,更全面地探讨曾国藩的家教思想。

参考文献:

- [1] 鍾叔河. 鍾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 孝亲编·教子编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2] 鍾叔河. 鍾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 兄弟编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3] 唐浩明. 曾国藩家书: 上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 [4] 唐浩明. 曾国藩家书: 下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 [5] 唐浩明. 曾国藩日记: 第2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 [6] 张宏杰.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2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7.
- [7] 唐浩明. 曾国藩日记: 第1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 [8]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7976.
- [9] 章太炎. 切要: 上册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49.

责任编辑: 陈璐